

# 吐火羅神祇考

林梅村

吐火羅語是塔里木盆地流行的一種印歐語系的死語言。本世紀初在新疆庫車、焉耆、吐魯番等地古代遺址和敦煌藏經洞曾發現大批用這種語言寫的宗教、文學和醫藥文獻。起初人們不知道這種語言叫什麼名字。根據吐魯番出土回鶻文劇本《彌勒會見記》題記上有關記載，德國語言學家繆勒和西格將其定名為“吐火羅語”。<sup>[1]</sup>

吐火羅語和公元前 1650～1190 年赫梯王國（今土耳其和敘利亞）流行的印歐古語——赫梯語關係密切，例如：兩者都用 -r 作為中間語態後綴，所以它有可能是印歐語系最古老的語言之一。<sup>[2]</sup>印歐語系具有顯著的地理特徵，可分為東方語支（包括雅利安語、大夏語、粟特語、波斯語、斯基泰語等）和西方語支（包括意大利-凱爾特語，希臘-拉丁語、英語、德語、斯拉夫語等）兩大語組。研究者驚奇地發現，吐火羅語的地理位置雖然在印歐語東方語支分佈區，但是語言特徵卻屬於西方語支。例如：數目字“一百”在吐火羅語兩個方言中寫作 kánt 和 kante。這與拉丁語 centum（一百）十分相近，但和梵語的 śata（一百）不盡相同。據此，語言學界將印歐語西支稱為“肯特姆語”（the Centum languages），並將印歐語東支稱作“森特姆語”（the Satem languages）。

正如中亞語言研究所揭示的，吐火羅語至少有三個方言：其一，西部方言，或稱吐火羅語 B，見於新疆庫車石窟和遺址出土的 8～9 世紀婆羅謎文寫卷、題記和文書；其二，東部方言，或稱吐火羅語 A，見於新疆焉耆和吐魯番古城出土的 8～9 世紀婆羅謎文寫卷和題記；其三，樓蘭方言，未見完整的文獻，但是大量樓蘭語詞彙保存在新疆樓蘭和尼雅古城出土的公元 3 世紀佉盧文犍陀羅語文書中。<sup>[3]</sup>此外，吐火羅語還有第四種方言，就是從敦煌西遷中亞的

大月氏人所操方言。“吐火羅人”這個名字就是希臘地理學家對大月氏人的稱謂。<sup>[4]</sup>可惜月氏人亦未留下文字材料，僅有零星月氏語借詞保存在先秦史籍和中亞貴霜碑銘中。

吐火羅語的發現大大深化了人們對歐亞大陸遠古民族分化遷徙的認識。就吐火羅人起源問題，學術界進行了長達一個世紀的激烈討論，但是吐火羅人究竟何時與講肯特姆語的赫梯人、凱爾特人以及希臘人分離？又如何千里迢迢來到塔里木盆地？至今仍是個謎。70年代末，中國學者開始介入吐火羅人起源問題研究，並在考古、語言和人類學三個方面取得許多新發現和重要研究成果。這些發現與研究表明，公元前2000年左右印歐人在東方的分佈已達新疆孔雀河流域至哈密盆地一綫。許多學者相信，這些年代最早、分佈最靠東方的印歐人就是後來定居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羅人的嫡系祖先。<sup>[5]</sup>

與此同時，中亞大月氏考古也取得突破性進展。1979年盜墓人在阿富汗西北邊境席巴爾甘東北5公里一個叫黃金之丘（Tillya-Tepe）的地方發現一處古代遊牧人墓地。正在阿富汗進行考古調查的蘇聯-阿富汗聯合考古團聞訊後立即趕赴現場進行發掘。由於阿富汗戰爭爆發，他們只挖了6座墓就被迫停止工作。這六座墓的規模都不太大，但出土遺物相當驚人，僅黃金藝術品一項就達20000餘件。據墓中出土安息銀幣、羅馬金幣和西漢昭明鏡判斷，黃金之丘墓地的年代約在公元前後幾十年。席巴爾甘距離大夏首都藍氏城（今阿富汗馬扎里沙里夫附近）不遠，當時大夏已在北方遊牧人大月氏統治之下。所以研究者普遍認為，黃金之丘墓地的墓主人就是公元前175年從敦煌西遷中亞的大月氏人。

儘管大月氏西遷中亞已近百年，但是黃金之丘墓地出土文物仍然反映了吐火羅人本族文化特徵。其中一個突出例證就是他們的許多藝術品都以龍為主題。敦煌寫本《唐光啓元年沙州伊州圖經》記載：“龍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肅、伊州各有首領。”兩《唐書》記焉耆的吐火羅王以龍為姓氏。敦煌漢文、于闐文和藏文寫本悉稱留居河西走廊的月氏殘部小月氏為“龍家”。基於上述考慮，我們在近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提出，黃金之丘墓地那些以龍為題材的藝術品屬於大月氏本族文化，龍是吐火羅人的圖騰。<sup>[6]</sup>中亞大月氏墓地的發現對

尋找他們在中國的故鄉具有相當重要的考古學意義，但是限於資料，我們當時只是提出問題，未能就此展開討論。

1993年應美國國家科學院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之邀，筆者到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專門從事中亞古代語言研究。那一年最大的收獲就是對吐火羅人的語言和宗教作了較為系統的調查，並在語言學方面找到解決大月氏人故鄉問題的一個突破口。<sup>[7]</sup>1996年4月重訪美國，出席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召開的中亞東部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古民族學術討論會。殊不知，我們近年一直潛心研究的吐火羅人問題竟然成為這次國際學術討論會的中心議題。<sup>[8]</sup>這次會議促使我們加快了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進一步論證了大月氏故鄉實際在今新疆天山東部巴里坤山、博格達山和阿爾泰山之間廣大草原地帶，而不是以前一直認為的在今甘肅敦煌。<sup>[9]</sup>本文將要討論的是吐火羅人原始宗教體系，旨在從宗教學角度探討吐火羅系統民族的來龍去脈。儘管某些論點仍不十分成熟，但我們還是想拿出來供大家討論，以期推動中國西部遠古文明研究的深入。

## 一、中亞大月氏墓地所出宗教藝術品的啟示

大月氏人以將佛教推廣到東方各地而聞名，但是黃金之丘墓地出土的數以萬計的黃金藝術品中幾乎看不出有什麼佛教色彩。那麼公元前1世紀大月氏人尚未皈依佛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創作的藝術品多以龍為主題。例如：黃金之丘2號墓出土的雙龍守護國王金頭飾（2.7）、3號墓出土的背向雙龍金頭飾（3.50）以及4號墓出土的雙龍紋金劍鞘（4.9）等（參見插圖一·1—2）。<sup>[10]</sup>因此吐火羅人的原始宗教應是某種龍神崇拜。龍非世間所有，大月氏的龍神究竟指什麼？值得深究。我們注意到，大月氏龍神的藝術形象有兩個特點。第一，大都表現了馬蹄和馬鬃，其藝術原形顯然是馬；第二，往往成雙成對出現。我們懷疑，吐火羅人的龍神可能是古代印歐人宗教中的雙馬神。

雙馬神是印歐人原始宗教系統中最古老的神祇之一。印度婆羅門教經典《梨俱吠陀》將其稱作 *nāsatya*（= *asvinau*，或譯“雙馬童”）。據雅利安宗教傳說，雙馬神是一對孿生的青年神使，常在黎明時刻降臨，給人類帶來財富，免

除災難和疾病。<sup>[11]</sup>既然吐火羅人和雅利安人都崇祀雙馬神，他們共有的這種宗教習俗必然產生於吐火羅人與雅利安人從原始印歐人部落分化以前。

目前學界對印歐人的起源地尚存爭議，但更多的證據表明，里海-黑海北岸銅石並用時代的顏那亞文化（Yamnaya Culture）和原始印歐文化的關係最爲密切。據人類學材料，顏那亞人屬於原始歐洲人種長顛類型。這個文化的分佈範圍，東起南烏拉爾，西至德涅斯特河，南達北高加索，北抵伏爾加河中游。顏那亞墓葬一般爲堆冢豎穴單人葬，舊稱“豎穴墓文化”（Pit-Grave Culture）。據 70 多個碳 14 年代數據的統計分析，顏那亞文化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3600~2200 年。這個時期印歐人顯然已有宗教意識。例如：黑海-里海北岸的諾伏亞勒克謝伏卡地區一座顏那亞古墓內曾發現一具嬰兒骨架被放置在兩個馬頭之間。1973 年黑海北岸克爾諾索伏卡地區顏那亞墓地發現的石人像爲研究印歐人原始宗教起源問題提供了更爲直接的證據。這個高約 1.2 米的石人像上身刻有一束梅花、三把斧頭和一把柳葉劍，石人像下方刻有雙馬神圖像（參見插圖一·3）。

70 年代初在伏爾加河與烏拉爾河之間謝澤地區發掘的顏那亞墓地不僅發現用雙馬殉葬的葬俗，還出土了一個長約 7 厘米的雙馬神殘石像（參見插圖一·4）。<sup>[12]</sup>這個雙馬石像顯然就是黃金之丘大月氏 3 號墓所出黃金頭飾（3.50）上雙馬神像的祖型。大月氏人改奉佛教後仍然尊奉雙馬神。例如：印度河上游犍陀羅佛教建築的石柱頭上就有雙馬神像。<sup>[13]</sup>古代印歐人崇祀雙馬神的習俗後來爲歐亞草原遊牧人所傳承。斯基泰人、薩爾馬提亞人和塞人等印歐語系遊牧人都在各自藝術品中創作了大量雙馬神像（參見插圖一·5—6）。<sup>[14]</sup>南西伯利亞的塔加爾文化和塔施提克文化墓地也發現過一些雙馬神像。一般認爲，這兩個文化的創造者是阿爾泰語系遊牧人。吐火羅人主要分佈在塞人與阿爾泰語系遊牧人之間，所以阿爾泰語系遊牧人大概是從吐火羅人那裏接受的印歐人宗教文化。<sup>[15]</sup>

## 二、從語言資料看吐火羅人的原始宗教

在印歐語系古民族中，雅利安人最先進入近東歷史舞臺。公元前 1450 年，

他們從北高加索南下，首先控制了本屬胡里安人領地的美索不達米亞北部，隨後兼並敘利亞和伊朗山地，建立了世界史上第一個雅利安國家——米坦尼王國。雅利安人統治米坦尼的歷史長達 140 年，公元前 1360 年滅於亞述。早期研究者曾把米坦尼王國的臣民胡里安人也當作印歐人。後來的研究表明，胡里安人實際上有自己獨立的宗教和語言，既不屬於印歐文化，也不屬於近東本地的閃米特文化。換言之，在米坦尼王國中只有上層統治階層屬於雅利安人。米坦尼遺址最重要的發現莫過於公元前 1380 年左右赫梯和米坦尼兩國訂立的協約，今稱 Mitanni Treaties（米坦尼協約）。這份協約的最後羅列了一系列胡里安宗教的神名，接着記錄了一組雅利安宗教的神祇，計有 mi-it-ra（光明之神）、in-da-ra（雷神）、a-ru-na（水神兼司法神）和 na-sa-at-ti-ya（雙馬神）。米坦尼協約記錄的雅利安諸神對研究印歐人古代宗教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它們不僅可以和古代印度、波斯宗教文獻記錄的神祇直接進行語言學比較，還有助於我們考察吐火羅人原始宗教的淵源問題。

印歐人原始宗教屬於多神教，崇拜對象大多為自然神，米坦尼的雅利安人仍然保持着這個古老的宗教傳統。米坦尼協約記錄的四位雅利安神分別相當於印度婆羅門教經典《梨俱吠陀》中的雙馬神奈撒特耶、雷神因陀羅、光明之神密多羅以及水神兼司法神婆羅那。<sup>[16]</sup>雅利安人和古代伊朗人有着更為直接的血緣關係。伊朗這個族名就是從“雅利安”一詞演變而來。雅利安人和波斯人本來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梨俱吠陀》和波斯古經《阿維斯塔》的許多內容，甚至神名都是相同的。例如：雅利安宗教的光明之神 mitra 就是波斯火祆教的火神 mihr。現存伊朗古代宗教文獻中未見和雅利安宗教水神相當的神祇，但是提到雷公和雙馬神。不同的是，在伊朗古代宗教中它們均以魔鬼身份出現。在《溫蒂達德》（Vendidad 10.9 和 19.43）中，這兩位神靈分別寫作 indra 和 nāhaiθya。<sup>[17]</sup>為便於比較，我們將上述四種古代印歐語神名列於下（參見表一）：

表一 四種古代印歐語神名比較表

神名	雙馬神/雙馬童	雷神	光明之神/太陽神	水天和司法神
音譯	奈撒特耶	因陀羅	密多羅	伐樓那
米坦尼雅利安語	na-sa-at-ti-ya	in-da-ra	mi-it-ra	a-ru-na
印度雅利安語	nāsatya	indra	mitra	varuna
古波斯語	nāṛhaiθya	indra	mihir	—
吐火羅語	ñakte	ylainäkte	mittär	—

雙馬神本為雅利安人、伊朗人、斯基泰人、塞人等印歐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祇之一。印歐人離開原始故鄉遷徙到世界各地以後，他們的宗教也逐漸從多神教向一神教演變。例如：印度的婆羅門教推崇公牛濕婆，羽人阿胡拉·瑪茲達成了古代伊朗火祆教的主神，阿爾泰山的塞人則對獅身鷹頭的格里芬情有獨鍾。<sup>[18]</sup>吐火羅人的原始宗教顯然也經歷了從多神教向一神教演變，這從他們對“神”的稱謂與其他印歐人不同可以說明。“神”字在吐火羅語 B 方言中寫作 *ñakte* (= A 方言的 *ñkät*)，相當於雅利安語的 *deva* (天神)。例如：新疆庫車出土的犍陀羅-吐火羅雙語文書中，吐火羅語 B 方言的 *ñaktemts soy* 和犍陀羅俗語的 *devaputra* (天子) 對譯。<sup>[19]</sup>此外，在吐火羅語宗教寫本中該詞往往和佛教或摩尼教神名共同構成複合詞。例如：*kaumñakte* (太陽神)、*puđñakte* (佛神)、*bramñakte* (梵天神) 和 *ylainäkte* (雷神) 等。由於吐火羅人對神的稱謂和其他印歐人不同，研究者至今不明吐火羅語“神”字的實際含義。德國薩蘭德大學的魯道夫·諾米爾推測這個吐火羅語詞相當於雅利安語的 *nihvaya(n) te* (祈禱)。<sup>[20]</sup>溫特教授認為其說不足信，但是這位德國吐火羅語專家亦未指出該詞的確切含義。<sup>[21]</sup>據上節討論，吐火羅人的神就是印歐人原始宗教中的雙馬神。既然如此，吐火羅語表示“神”的詞 *ñakte* 應該相當於雅利安語 *nāsatya* (雙馬神)。兩者在語音學上確實有聯繫。因為雅利安語 /s/ 或 /s/ 在吐火羅語中通常寫作 /k/。例如：數目字“一百”在雅利安語中寫作 *sata*，相當於吐火羅語 B 方言的 *kante* (= A 方言的 *känt* “一百”)。由此推之，如果吐火羅

語中有“雙馬神”一詞，它應寫作 *nākatya* (=《梨俱吠陀》的 *nāsatya*)，或 *nakatiya* (=《米坦尼協約》的 *na-sa-at-ti-ya*)。這個詞無疑即吐火羅語 B 方言的 *nakte*，本義應是“雙馬神”，後來才演變為吐火羅人對神的統稱。

### 三、從古代岩畫看吐火羅的古代宗教

《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破，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這段文字出自元朔元年（前 128 年）張騫向漢武帝所作報告。據陳夢家考證，元封四或五年（前 107/106 年）漢朝才在敦煌設立郡縣。也就是說，張騫時代敦煌郡尚不存在。張騫從大月氏人聽到的“敦煌”是否指漢代敦煌郡所在地（今甘肅敦煌）需要慎重考慮。眾所周知，中國北方遊牧人與南方農耕民族的分界大致在長城地帶；在西域則以天山為界。大月氏是遊牧人，他們的故鄉不會在長城和天山以南地區。據我們最近研究，張騫報告中的“祁連”實際上在唐代祁羅漫山，他所謂“敦煌”指《山海經·北山經》的“敦薨山”，也就是《漢書·西域傳》提到的天山山北六國中的“單桓”。前者在今新疆哈密巴里坤山，後者在今新疆昌吉博格達山，兩山大致位於東部天山北麓。<sup>[22]</sup>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人興起以前，長城以北的政治格局是“東胡疆而月氏盛”。可見月氏人鼎盛時期，向東可達鄂爾多斯草原。

《淮南子·要略》介紹長城以北流行的古代宗教說：“操舍開塞，各有龍忌。”高誘注：“中國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崔浩注：“西方胡皆事龍神。”漢代文獻稱長城為“邊塞”，或簡稱“塞”。西方胡指講印歐語系語言的西域人，自然包括月氏、龜茲、樓蘭等吐火羅系統古部落。那麼長城以北月氏人的“龍忌”或“請龍”應是某種龍神崇拜。據前文討論，吐火羅人的龍神實乃雙馬神。他們“請龍”的宗教儀式疑與雅利安宗教的 *asva-medha*（馬祠）或 *hayagriva*（馬祭）有共同的宗教淵源。<sup>[23]</sup>

《詩經·大雅·皇矣》提到周人有“是瀨是禡”之俗。關於周人的這種宗教

活動，《周禮·夏官·廋人》介紹說：“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駮，六尺以上爲馬。”《周禮》成書於戰國時期，戰國一尺相當於23.1厘米，八尺則是1.85米。這種身高近兩米的高頭大馬自然不是蒙古馬，而是來自西域的“天馬”。而祭祀八尺以上中亞馬的宗教活動大概就是胡人所謂“請龍”。漢代文獻也提到龍係八尺以上的高頭大馬。《說文·馬部》曰：“馬七尺爲駮，八尺爲龍。”因此周人“是禡”的宗教活動實乃胡俗。周人故鄉古豳國（今陝西長武）地近戎狄，因而有此胡俗。那麼大月氏故鄉——東部天山地區在古代宗教遺迹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1987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東部天山深處發現了一處反映古代宗教內容的大幅岩畫，發現地點位於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圖壁縣西南約75公里，當地人稱“康家石門子”。1989年9月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炳華的陪同下，我和國家文物局的幾位同事到呼圖壁實地考察了這處古代岩畫。岩畫刻在巨大的懸崖峭壁底部的崖壁上，石質係侏羅紀頂部喀拉扎組沙礫岩。整個畫面東西長14米，上下高9米，總面積達120多平方米，十分壯觀。岩畫內容可分爲七組（I—VII）。其中，“I組居岩壁最上方，是一列裸體女性舞蹈圖像和一個斜卧的男性形象，共刻畫10個人物形象。其中女性9人由右向左，逐漸縮小。每3人之間，有一組對馬圖形……這組群像不僅位置高，而且形體大，特徵鮮明。最右側的女性最高，達2.04米……兩組對馬圖案，一組位於右起的第三四人之間，對馬的頭、前腿和後腿，彼此聯結，形成一個封閉的圖形。馬長頭長頸，身體細瘦。尾垂於下，通體涂朱。另一組對馬，位於右起第六七人之間。形體特徵基本同前，只是突出畫了雄性的生殖器官，彼此相接，未涂顏色。”<sup>[24]</sup>由於康家石門子岩畫以裸體舞蹈和男女交媾爲主要內容，目前被稱爲“生殖崇拜岩畫”（參見插圖二）。王炳華注意到，康家石門子岩畫上的對馬圖像與伊朗高原盧里斯坦出土的青銅器中的雙馬神有聯繫（參見插圖三·1—2）。<sup>[25]</sup>這個宗教傳統還影響到後來的波斯藝術，所以古波斯石刻藝術中亦有雙馬神像（參見插圖三·3）。盧里斯坦位於伊朗西部扎格羅斯山區，自本世紀20年代起，這裏陸續發現大批具有游牧文化特色的青銅器，包括車馬器、管盞式銅斧、柳葉劍、動物紋牌飾。可惜多爲盜掘品，經科學發掘的不多。有些銅器



與帶有阿卡德時期楔形文字的器物共存，年代約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但是多數銅器年代較晚，屬於公元前 900~700 年間。美國伊朗藝術史家波普傾向於將盧里斯坦青銅器的年代定在公元前 2000~1000 年。<sup>[26]</sup>據此，王炳華將康家石門子岩畫的年代斷在公元前 1000 年前半期，並推測其內容或與塞人的宗教活動有關。<sup>[27]</sup>我們的看法略有不同。塞人主要分佈在伊犁河流域至阿爾泰山區一綫。由於勢力強大的吐火羅人的阻隔，塞人很難進入天山東部地區。所以塞人在中國史籍中出現較晚，張騫通西域以後才見諸文獻。另一方面，塞人起初以獅身鷹頭的格里芬為圖騰，後來改奉火祆教。<sup>[28]</sup>而康家石門子岩畫上的對馬顯然是吐火羅神祇——雙馬神。所以康家石門子這組岩畫的宗教內涵應為《淮南子·要略》提到的胡人宗教“請龍”，當與吐火羅人的宗教活動有關。

先秦時期，月氏人是吐火羅系統民族中最為活躍的一支。他們的活動範圍相當大，西起天山南北，東至鄂爾多斯草原。所以長城以北地區也有胡人“請龍”的宗教遺迹。據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蓋山林調查，內蒙古陰山地區共發現五組雙馬神岩畫（參見插圖四·3—7）。

第一組：位於陰山北麓烏拉特中旗西南部幾公海勒斯太（蒙語“東榆樹山”）溝第 6 地點，編號 6:11 組。“面積高 0.20，寬 0.45 米。岩畫鑿刻在山西面山腳下的一塊面朝上的巨石上。畫面是一對馬，頭相對。左邊那匹馬作蹲踞狀，右邊的則作佇立之形。”此地南距五原縣約 40 公里，西南距東地里哈日約 5 公里。這是陰山岩畫最密集的地區之一，也是陰山岩畫最靠東方的地點。<sup>[29]</sup>

第二組：位於陰山南麓五原縣韓烏拉山第 12 地點西地里哈日山腰，編號 12:29 組。“高 0.30，寬 0.60 米，岩畫鑿在必金河西畔岩壁上。畫面只表現了頭對頭的一對馬，而左邊的那匹馬尾巴短小，身軀高大得不成比例。”<sup>[30]</sup>這裏曾是古代交通要道，趙武靈王修築的趙長城，就經過韓烏拉特山之北，一直到兩狼山口——高闕塞。《淮南子·要略》所云胡人“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或在此地。

第三組：位於陰山南麓五原縣韓烏拉山第 13 地點東地里哈日山腰，編號 13:7 組。“高 0.25，寬 0.60 米。畫面是兩頭公馬，頭對頭，造型生動。”這組岩畫位於第一組陰山雙馬神岩畫發現地點東北約 5 公里。<sup>[31]</sup>

第四組：位於內蒙古磴口縣西北阿貴廟以北黃河西岸的托林溝北山（長斯特羅蓋）東段第 26 地點，編號 26:7 組。“高 0.43，寬 0.26 米。岩畫鑿刻在山頂一塊迎南的石壁上，兩馬相對。它的敲鑿方法是，先琢鑿成輪廓，通體再用尖鑿加以仔細雕琢。鑿下的細小的麻點尚能看出。”<sup>[32]</sup>磴口縣於漢代屬朔方郡麻渾縣，是中原與西北遊牧人交往的主要通道。《漢書·地理志》朔方郡條曰：“西部都尉治麻渾（縣）……麻渾，有道西北出鷄鹿塞，屠申澤在東。”東漢竇憲三戰北匈奴就是從鷄鹿和高闕兩塞出兵漠北。古地名“鷄鹿”似乎來自胡語。如果真是胡語，該詞可能源於吐火羅語 A 方言的 saru（= B serwe，獵人）。據美國語言學家 Don Ringe 博士分析，這個吐火羅語詞源於原始印歐語的 kēruos，意為“牡鹿、野獸”。<sup>[33]</sup>這個地名的胡語詞源表明，鄂爾多斯曾為吐火羅系統遊牧人的牧地。

第五組：位於內蒙古磴口縣托林溝北山（長斯特羅蓋）東段第 26 地點，編號 26:20 組。“高 0.67，寬 0.35 米。鑿刻在小山頂的立壁上，迎北。下方是一對馬，造型美觀自然。上方又鑿了一只笨拙的動物。”<sup>[34]</sup>

目前古代岩畫研究的最大難點是如何斷代。不過有迹象表明，天山和陰山岩畫的雙馬神像的年代甚早，可能要追溯到晚商時期。因為晚商青銅器的族徽符號中出現了類似於陰山岩畫的雙馬神像（參見插圖五）。例如：《金文編》著錄的“雙馬與大象”（父辛鼎）、“雙馬與大豕”（作從簋）、“雙馬與大馬”（屯簋）、“雙馬與大馬”（作父辛尊）、“雙馬與大馬”（作父丁尊）以及上海博物館藏作父從卣上的“雙馬與大馬”。<sup>[35]</sup>大豕部族見於武丁卜辭，是商代晚期一個重要部族。大豕曾承王命討伐商朝的敵國，時常以“致羌”或“以羌”等形式向商王朝獻俘，稱臣納貢。<sup>[36]</sup>

羌人起源於甘肅和青海。印歐人向東遷徙時代，甘青地區分佈着兩個頗為發達的早期青銅文化——齊家文化和四壩文化。據人類學測定，這兩個文化的創造者均屬蒙古人種。<sup>[37]</sup>所以研究者普遍認為，這兩個文化可能代表了羌人早期文化。<sup>[38]</sup>四壩文化相當發達，近年考古發現表明，四壩類型的陶器向西一直分佈到新疆哈密盆地。<sup>[39]</sup>看來，以齊家和四壩兩個方化為代表的強大的羌人集團遏止了古代印歐人東進的步伐。據碳 14 年代數據，四壩文化形成於公元前

2000年，大約公元前1600年逐漸衰落。那麼印歐人繼續東進，最後抵達鄂爾多斯草原，大概在四壩文化衰落以後的晚商時期。既然晚商大豕諸部與羌人爲鄰，這些以雙馬神爲圖騰的古代部族或許就是活躍在巴里坤至鄂爾多斯草原的吐火羅系統遊牧人。

70年代新疆哈密盆地曾發現與殷墟婦好墓所出形制完全相同的龍首刀，同樣的龍首刀亦在山西保德晚商墓葬出土。<sup>[40]</sup>由此可見，從康家石門子經巴里坤、哈密、山西保德，最後到殷都大邑商（今河南淇縣）有一條非常古老的通道。晚商以來，以月氏人爲代表的吐火羅系統遊牧人一直控制着這條東西交通孔道。婦好墓出土的和田古玉就是經吐火羅系統遊牧人之手，從新疆傳入中原的。<sup>[41]</sup>那麼天山和陰山古代岩畫上的雙馬神可能要追溯到晚商時期——公元前1300~1100年間。

#### 四、吐火羅藝術在中國北方草原的傳播

春秋戰國到西漢初年，月氏人一度稱霸中國北方草原。《史記·匈奴列傳》記載：“當是之時（前209年），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匈奴單于的稱號“頭曼”即後世突厥可汗的稱號“土門”，突厥語作 *tümana*。英國突厥學家克勞森首先注意到這個突厥語稱號實際上來自吐火羅語，相當於吐火羅語 A 的 *tman* 和吐火羅語 B 的 *tumane*，本義爲“萬”，引申爲“萬戶長”。<sup>[42]</sup>匈奴單于和突厥可汗的“萬戶長”稱號疑爲大月氏王所封。據《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太子冒頓曾被送到月氏王庭作人質。由此可見，月氏人一度是中國北方草原諸部落的霸主。他們在中國北方草原和農牧交界地帶頻繁活動，不可能不留下任何遺迹。吐火羅人崇祀雙馬神，那麼中國北方草原和農牧交界地帶出土的各類雙馬神藝術品應該屬於吐火羅宗教藝術。

1978年河北易縣燕下都辛莊頭戰國晚期墓地30號墓出土了一批帶雙馬神像的金銀牌飾和馬具。計有雙馬紋金方牌3件、雙馬紋金節約4件、雙馬紋銀方牌5件（參見插圖六·1—2）。<sup>[43]</sup>這些發現爲研究戰國時代吐火羅藝術的東傳提供了重要標本。<sup>[44]</sup>這座墓爲中字形土坑豎穴墓，墓室長6米，寬5米，墓口

到墓底深 8 米，南墓道長 8 米，北墓道長 4.2 米。隨葬的仿銅陶禮器有七鼎六簋。報告推測墓主人應是燕國貴族，並說：“30 號墓出土的金柄鐵劍和金銀飾件上的紋飾絕大部分都是牛、馬、羊、駱駝、鹿、熊和怪獸等，顯示了燕文化與北方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sup>[45]</sup>

春秋初期，周王室的軍事力量逐漸衰敗，燕國開始處於北方戎狄的包圍之中。春秋中期以後，燕國屢遭山戎等北方游牧人的侵擾，國勢岌岌可危。這時齊國崛起，稱霸中原。公元前 651 年齊桓公出兵伐山戎，這才拯救了燕國。<sup>[46]</sup>此事見於許多先秦文獻，《管子·小匡》曰：齊桓公“中救晉公，禽（擒）狄王，敗胡貉，破屠何，而騎寇始服。北伐山戎，制冷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於石枕。縣（懸）車束馬，逾大行與卑耳之谿，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這段文字對了解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古民族的分佈相當重要。據考證，山戎在今燕山北部，孤竹在今河北盧龍，離支在今河北遷安縣。<sup>[47]</sup>史載匈奴王族姓孛鞞氏。<sup>[48]</sup>齊桓公所伐“離支”在其他文獻中作“冷支”（《管子·小匡》）或“令支”（《逸周書·王會篇》）。而孛鞞、冷支、令支讀音相近，疑指同一部族。所以齊桓公所伐離支可能就是後世之匈奴。秦夏或作“大夏”，地近流沙（今內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大致在鄂爾多斯草原。

齊桓公首先討伐的孤竹、山戎地近東方，似屬東胡系統游牧人；最後討伐的大夏地近西方，疑即吐火羅系統的月氏人。大夏其名和古希臘作家提到的中亞東部草原部落“吐火羅”讀音接近，所以王國維以來，許多研究者都認為先秦文獻的“大夏”就是唐代文獻的吐火羅。<sup>[49]</sup>文獻還稱大夏為“龍夏。”《管子·輕重丁篇》曰：“敢問齊國方幾何里，（海）涯龍夏。”同書《山至數篇》亦曰：“龍夏以北至海莊，禽獸牛羊之地。”吐火羅人以龍為圖騰，故有“龍夏”之稱。所以燕下都 30 號墓所出雙馬紋藝術品可能來自稱霸北方草原的吐火羅系統月氏人。吐火羅藝術對燕文化的影響不僅表現在金銀裝飾藝術方面，可能還滲透到燕文化建築藝術中。燕下都出土瓦當和闌干磚上的雙龍紋（參見插圖六·3 和 5）與南西伯利亞出土古代游牧人黃金牌飾（參見插圖六·6）上的雙龍紋如出一轍，其藝術母題可能都淵源於吐火羅人雙馬神宗教藝術。<sup>[5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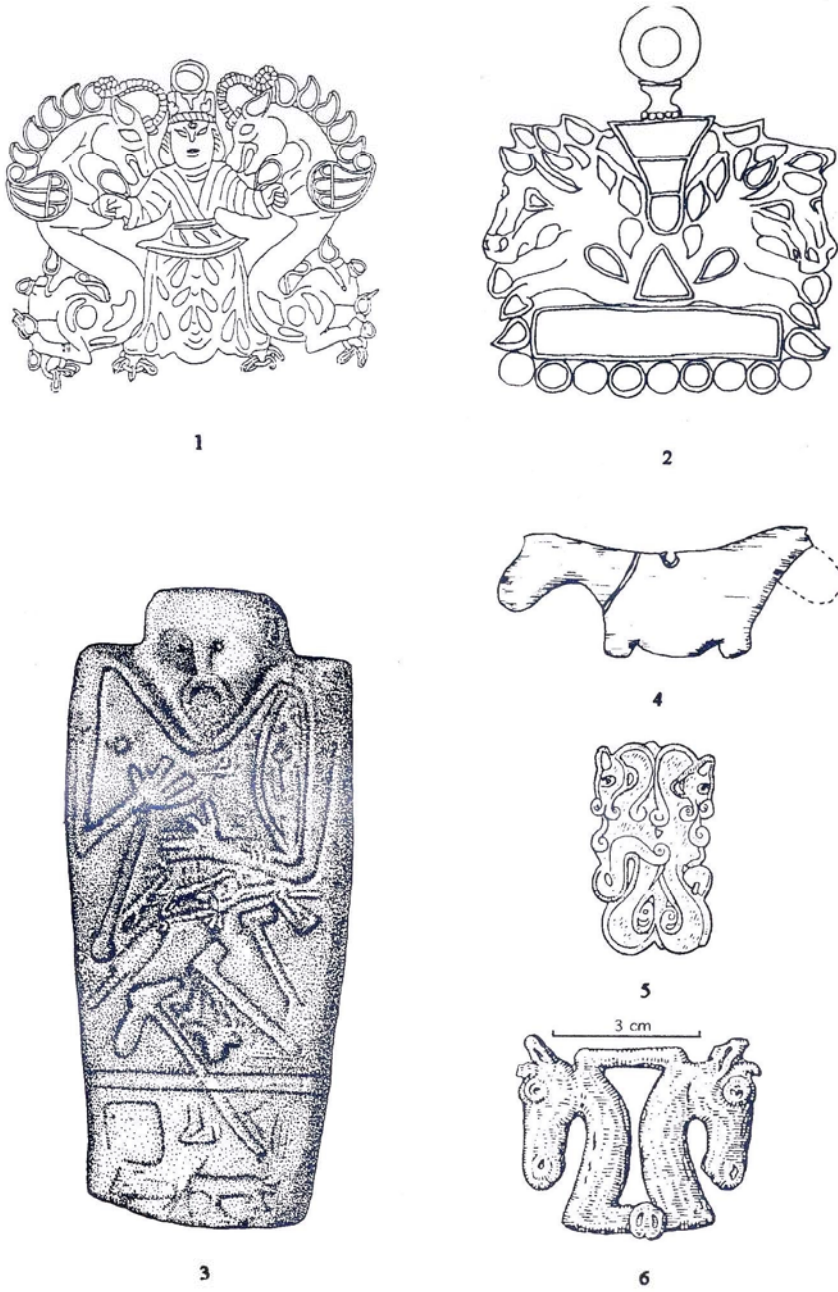
1979年內蒙古準格爾旗西溝畔戰國墓地發現一批帶有雙馬神像的藝術品，因而為研究吐火羅藝術在鄂爾多斯草原的傳播提供了重要標本（參見插圖七·1—3）。其中2號墓出土了兩件雙馬神金飾片。其一為卧馬紋金飾片（編號2:47），“長方形，框內有雙馬對卧紋，四肢內屈。金片中間有折疊痕迹。長11.7、寬5.7厘米，重13克”。其二為雙馬紋飾片（編號2:59），“長方形，框內有雙馬紋，頭部相對。金片一端有圓形孔，孔上有釘眼，上壓金泡形飾。長9、寬3.4厘米，重4克”。<sup>[51]</sup>該墓還有一個對馬紋銅帶扣（編號2:80）。這座墓的墓坑呈南北向，有男性人骨，頭向北偏東25度，無葬具，墓壙不清。在頭骨左假發現馬、羊頭骨多具。發掘簡報推測此墓與匈奴人有關。但是從墓中隨葬雙馬神藝術品看，墓主人可能是當時稱霸中國北方草原的吐火羅系統遊牧人。早在30年代，鄂爾多斯就曾發現許多帶有雙馬神像的金銀或青銅牌飾，大多流散海外，屬於巴黎盧芹齋收集品。<sup>[52]</sup>雙馬神圓雕紋飾亦見《內蒙古長城地帶》著錄的鄂爾多斯青銅器。其中一把獸柄青銅劍上的雙馬紋的後肢呈180度翻轉狀（參見插圖六·4）。據考證，這種後肢翻轉的動物紋廣泛流行於歐亞草原，年代約在公元前5~4世紀。<sup>[53]</sup>

1983和1985年寧夏同心縣倒墩子西漢中晚期遊牧人墓地再次發現雙馬或雙龍紋牌飾（參見插圖七·4—6）。其中1號墓出土了一件透雕雙龍紋牌飾（編號1:4），上有“透雕雙龍紋，邊框飾柳葉形花紋，雙龍間有獸頭及圓形、菱形紋飾……長10.2、寬5.9厘米”；5號墓出土了兩件對馬紋鑲金銅牌飾（編號5:9和11），“兩件相同，均鑲金，浮雕兩個伏卧狀馬，後半個軀體向上翻轉，馬身配一獸頭，邊框飾麥穗紋……殘長7.3、寬5.6厘米”；19號墓出土兩件雙馬神鑲金銅牌飾（編號19:9和10），“兩件相同，均鑲金，浮雕兩個伏卧狀馬，後半個軀體向上翻轉，周邊飾麥穗紋……長10.6、寬5.3厘米”。<sup>[54]</sup>這個墓地含有長方形豎穴墓和偏洞室墓兩類墓葬，雙馬紋牌飾均出自豎穴墓。倒墩子1號墓所出透雕雙龍紋牌飾的藝術主題是雙龍守護生命樹，俄國學者以前在南西伯利亞曾採集到類似的青銅牌飾，但製作工藝更為精美，年代斷在公元前4世紀。<sup>[55]</sup>發掘簡報推測倒墩子墓地屬於南匈奴遺存。從漢代文獻記錄的匈奴語詞彙看，匈奴王族孛鞞氏可能是講阿爾泰語系語言的牧人，但是匈奴

部落聯盟眾多部落的種族成分相當複雜，既包括阿爾泰語系遊牧人，亦有塞人和吐火羅人部落。倒墩子墓地的文化成分顯然不是單一的。其中豎穴墓和內蒙古西溝畔戰國墓以及中亞大月氏人墓葬形制相同，並出有雙馬神牌飾（參見插圖七·4—6）。所以這些墓葬的墓主人也許是匈奴部落聯盟中吐火羅系統遊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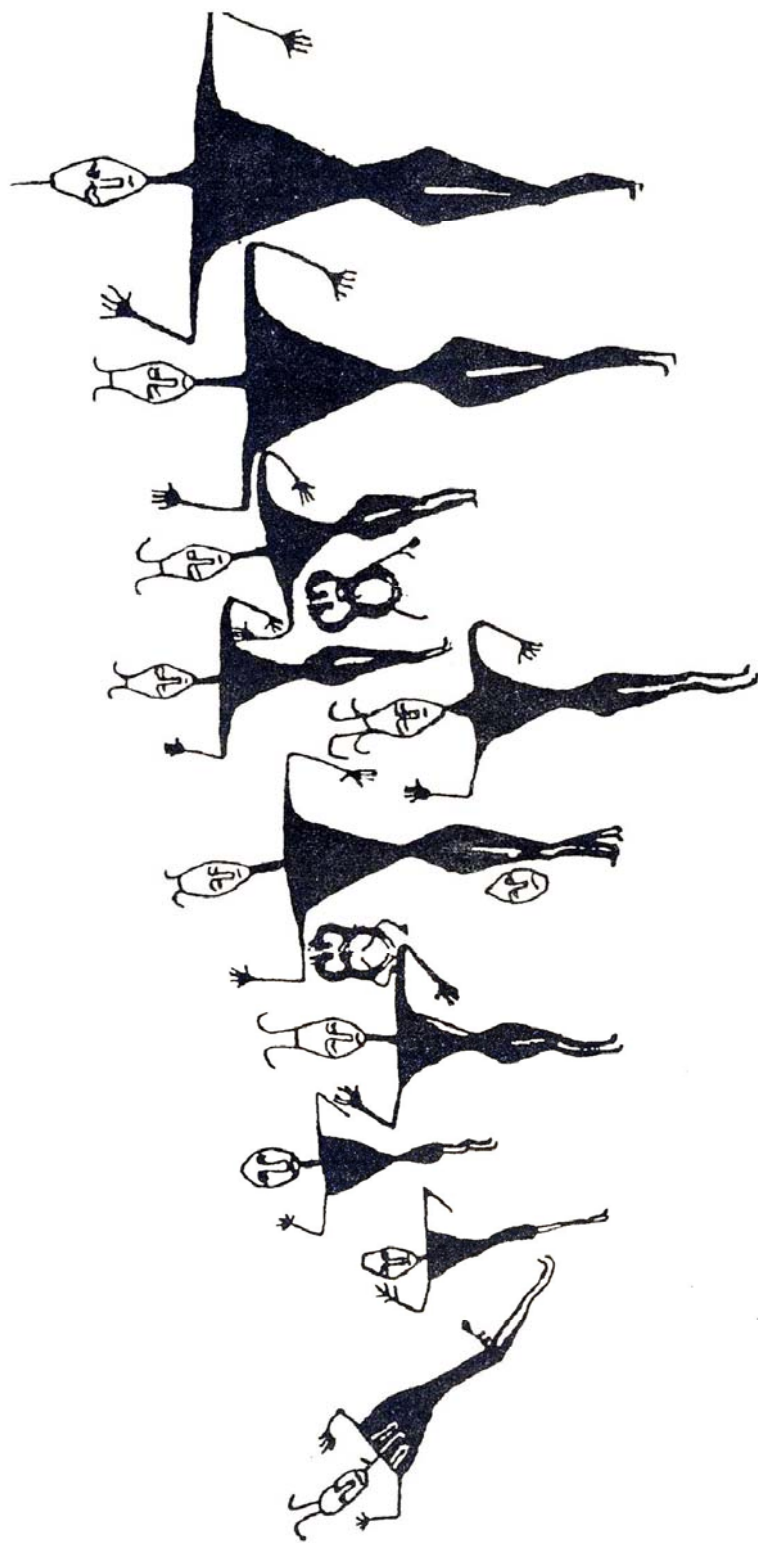
1980年新疆吐魯番艾丁湖畔發現一處漢代墓地。據簡報描述，其中有紫銅的“帶扣動物紋飾牌1件（80TADMO:13）。長8.2厘米，寬4.5厘米，厚0.3厘米；正面鑄成透雕狀一對卧馬，馬背相聯，頭尾相銜，背面有三個環紐，位於三個角部”（參見插圖七·7）。<sup>[56]</sup>這個雙馬紋透雕牌飾和漢初銅鏡共存，而艾丁湖距離大月氏統治中心巴里坤草原不遠。所以這個發現為尋找大月氏故鄉遺址和墓葬提供了重要線索。

據以上四節討論，吐火羅人的古代宗教是某種龍神崇拜，先秦文獻稱之為“請龍”。中亞大月氏墓地所出以龍為題材的藝術品表明，吐火羅人龍神的藝術原形實乃印歐人原始宗教的雙馬神。這和先秦文獻將中亞馬稱作“龍”是一致的。這個認識還得到語言學證據的支持。吐火羅人對“神”的稱謂 *nakte* 正相當於印度雅利安語 *nāsatya*，或米坦尼雅利安語的 *na-sa-at-tiya*，意為“雙馬神”。雙馬神本是印歐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祇之一，始見於公元前3200—2200年里海-黑海北岸的顏那亞文化。隨着印歐人的分化遷徙，他們的宗教逐漸從多神教向一神教發展演變，印度雅利安人推崇公牛濕婆，羽人阿胡拉·瑪茲達成了伊朗火祆教的主神，阿爾泰山的塞人以獅身鷹頭的格里芬為神靈，而吐火羅人獨尊雙馬神。由此可見，新疆天山、內蒙陰山古代岩畫上的雙馬神像以及中國北方草原和農牧交界地帶出土的雙馬紋藝術品，即便不是吐火羅人親自製作的，也是在其宗教文化影響下產生的。



插圖一

1—2. 席巴爾甘大月氏墓地出土雙馬神像；3—4. 里海-黑海岸顏那亞墓地出土雙馬神像；  
5. 東南歐斯基泰墓地出土雙馬神像；6. 哈薩克斯坦塞人墓地出土雙馬神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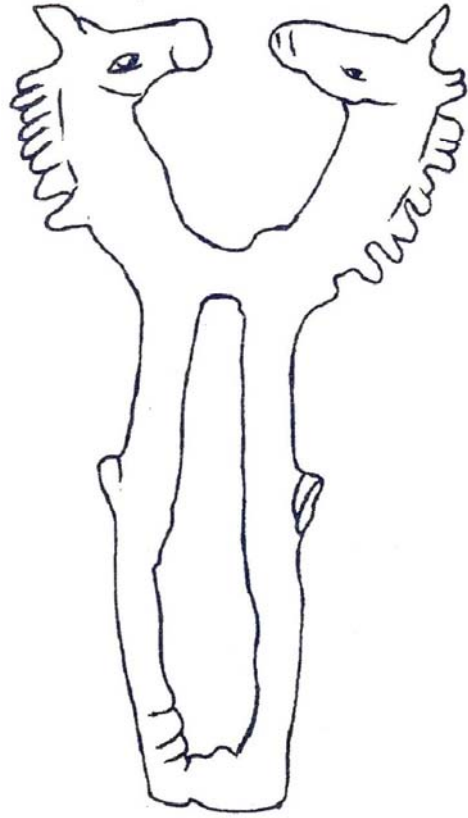


插圖二 新疆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古代岩畫上祭祀雙馬神的宗教舞蹈（編號：I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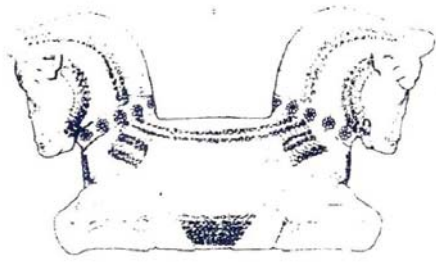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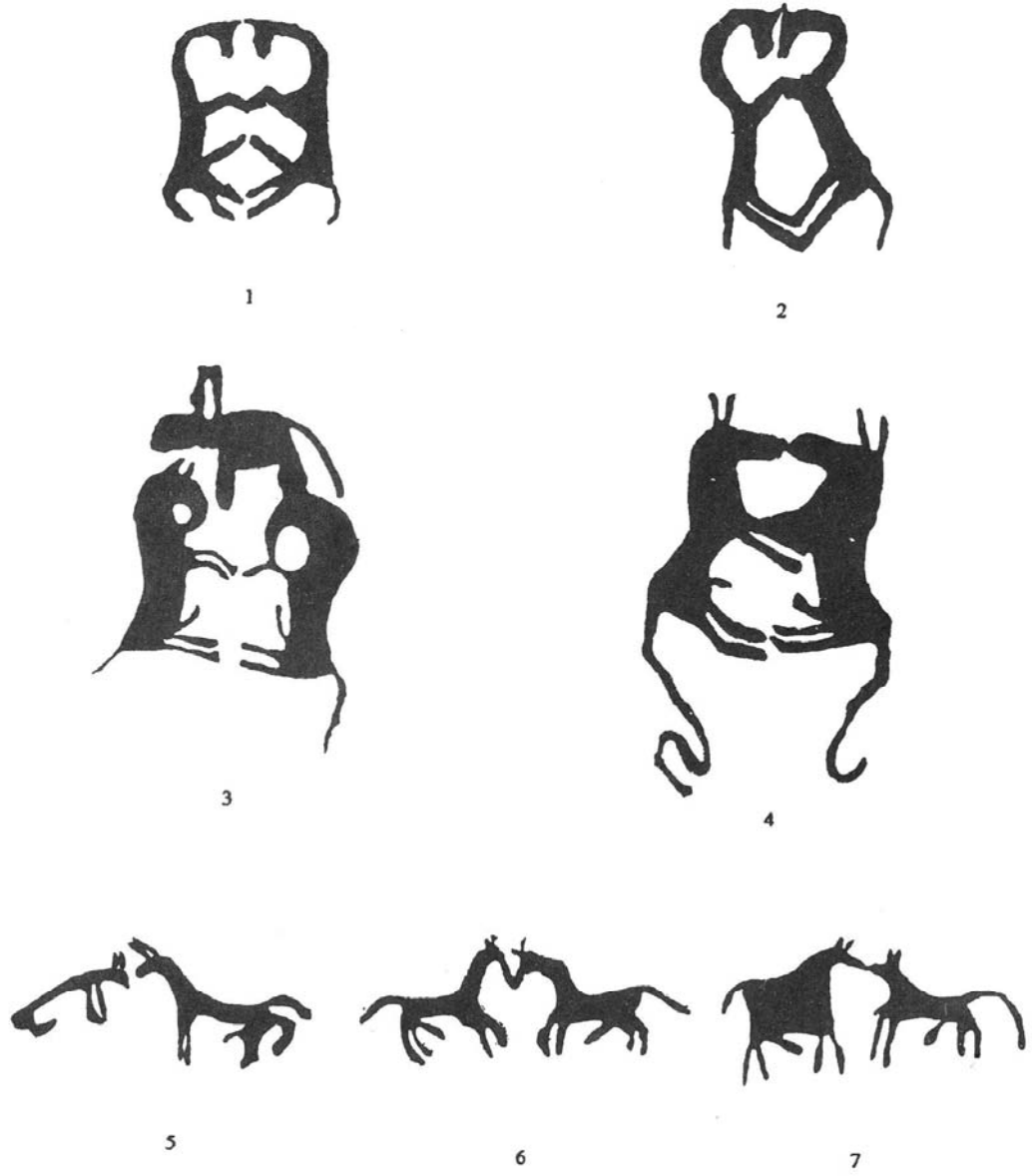
2



3

插圖三

1—2. 伊朗盧里斯坦青銅器上的雙馬神像；3. 古波斯石雕中的雙馬神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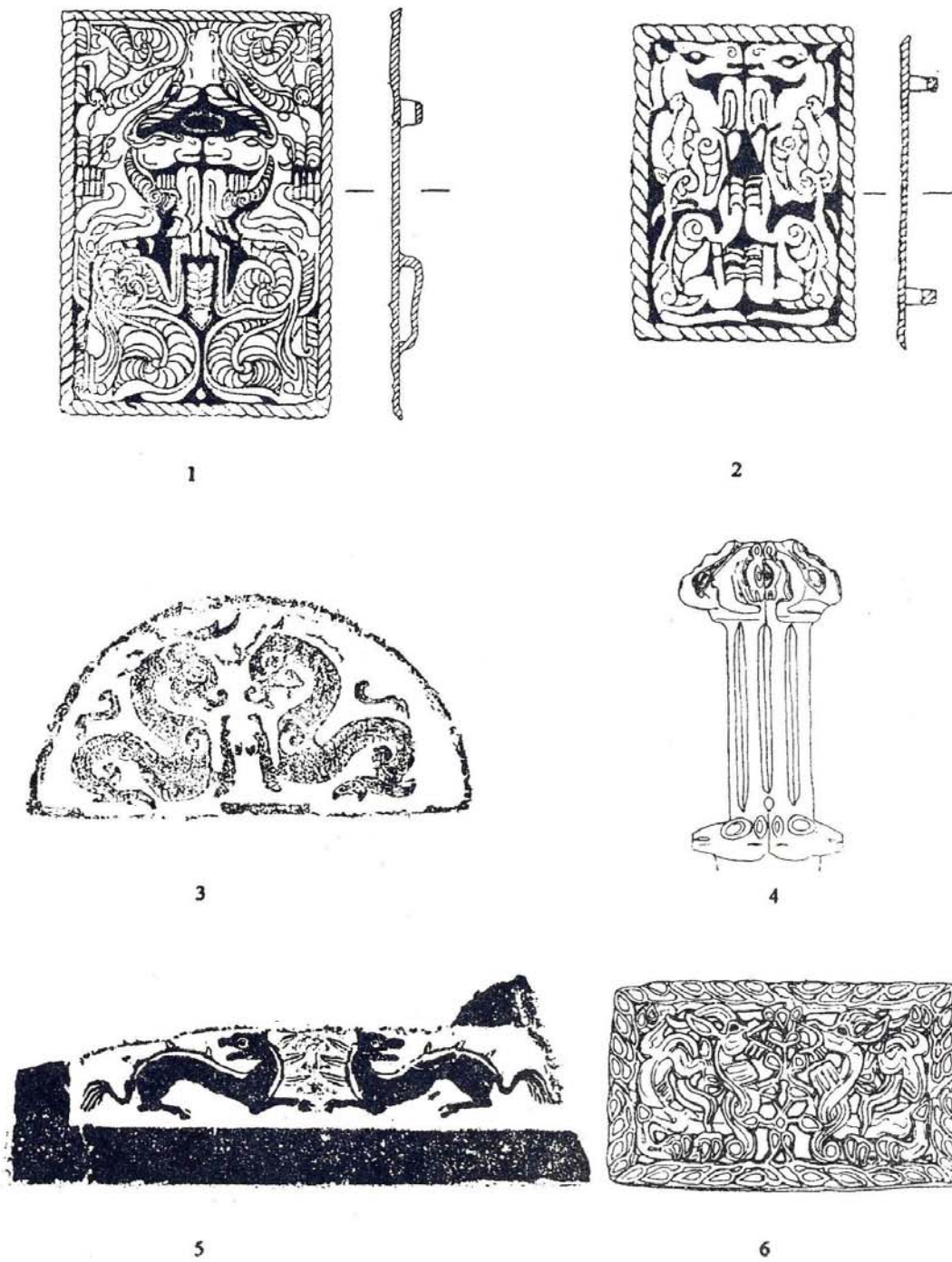


插圖四

1—2. 新疆天山古代岩畫上的雙馬神像；3—7. 內蒙古陰山古代岩畫上的雙馬神像



插圖五 晚商青銅器族徽上的雙馬神像



插圖六

- 1—3 和 5. 河北易縣燕下都 30 號墓出土金牌飾、瓦當和闌干磚上的雙馬神像；  
 4. 《內蒙長城地帶》著錄的青銅劍柄上的雙馬神像；6. 南西伯利亞出土雙馬神金牌飾

## 注 釋

- [1] F. W. K. Müller und E. Sieg, "Maritrisimit und Tocharisch," *SPAW*, 1916, 416~417.
- [2] H. Pedersen, "Hittite and Tocharian," *Language*, 9, 1933, 13~34, A. Meillet, "Le Tokharien," *Indo-Germanisches Jahrbuch* I, 1914, 1~19, D. Q. Adams, "The Position of Tocharian among the othe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JAOS*, 104, 1984, 395~402.
- [3] W. Winter, "A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of 'Tocharian' B Texts," *JOAS*, 75, 1955, 216~225, T. Burrow, "Tocharian Elements in Kharosthī Documents," *JRAS*, 1935, 667~679.
- [4] 關於古典作家對吐火羅人的記載，參見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vol. V, trans. by H. L. Jone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261.
- [5] 參見徐文堪：《新疆古尸的新發現與吐火羅人起源研究》，《學術集林》第五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第304~314頁。
- [6] 林梅村：《大夏黃金寶藏的發現及其對大月氏考古研究的意義》，《文物天地》1991年第6期；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語言和宗教新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第267~279頁。
- [7] 林梅村：《祁連與昆侖》，《敦煌研究》1994年第6期第22~24頁。
- [8] 會議綜述參見徐文堪：《中亞東部銅器和早期鐵器時代民族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學術集林》卷九，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第262~279頁。
- [9] 林梅村：《吐火羅人與龍部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第11~20頁。
- [10] V. Sarianidi,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from the Tillya-tepe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Afghanistan*, Leningrad: Aurora Art Publishers, 1985, 93, 98-103, 220.
- [11] M. Monier-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9 (repr, 1979), 116 and 538; 金克木：《梵語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第21~23頁。
- [12] J. P. Mallory, *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s: Language, Archaeology and Myth*,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9, 176, 204 and 210-221.
- [13] 樋口隆康：《ツルクロード考古學》，京都：法藏館，昭和61年，第16頁，圖20。
- [14] J. Davis-Kimball, V. A. Bashilov and L. T. Yablonsky (ed.),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Berkeley: Zinat Press, 1995, 39, 49, 127.

220~222 and 311.

- [15] 參見 J. Davis-Kimball 等人，前揭書，第 39, 49, 127, 220-222 和 311 頁及吉謝列夫著、莫潤先譯：《南西伯利亞古代史》下冊，烏魯木齊：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85 年，第 62~63 頁及圖版叁柒·2 和叁捌·3。
- [16] 關於《梨俱吠陀》的雅利安神，參見 C. Renfrew,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79 (reprinted in 1990).
- [17] 關於這個問題的新的討論見 T. Burrow, "Proto-Indoaryans", *JRAS*, 1973, 123~124; R. Ghirshman, *L' Iran et la Migration des Indo-Aryens et des Iraniens*, Leiden, 1977, A. Parpola, "Margiana and the Aryan Problem," in: F. Hiebert (ed.), *New Studies in Bronze Age Margiana (Turkmenistan)*, *Information Bulletin*, 19, 1993, 41-55.
- [18] 關於塞人宗教問題，參見孫培良：《斯基泰貿易之路和古代中亞的傳說》，《中外關係史論叢》第 1 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 年，第 8 頁。
- [19] W. Winter, "Tocharians and Turks," *Aspects of Altaic Civil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Meeting of the Piac held at Indiana University, June 4~9, 1962*, *Ural and Altaic Studies* 23,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63, 239-251.
- [20] R. Normier, "Tocharisch näkte \ nkät 'God',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Band 94,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1980, 251-281.
- [21] W. Winter, "Tocharian B näkte, A nkät 'God': Two Nouns, Their Derivatives, Their Etymology," *JIES* 15. 3~4, 1987, 296~323.
- [22] 林梅村：《吐火羅人與龍部落》，《西域研究》1997 年第 1 期第 11~20 頁。
- [23] 關於印度雅利安人的馬祭，參見 R.H. van Gulik, *Hayagriva, the Mantrayanic ASpect of Horse-Cult in China and Japan*,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Horse-Cult in India and Tibet, Leiden: E.J.Brill, 1935.
- [24] 王炳華：《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岩畫初探》，收入《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62~367 頁，圖三。
- [25] 王炳華，前揭書，第 397 頁。
- [26] A. U. Pope, "Dated Luristan Bronzes," *BAIPAA*, VII, 1934, 19-20.
- [27] 王炳華，前揭書，第 381~382 頁；第 397~398 頁。
- [28] 關於塞人宗教問題，參見孫培良：《斯基泰貿易之路和古代中亞的傳說》，《中外關係

- 史論叢》第1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第8頁；林梅村：《從考古發現看火祿教在中國的初傳》，《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第54~60頁。
- [29] 蓋山林：《陰山岩畫》，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8，45和48~49頁，圖49。
- [30] 蓋山林：前揭書，第96~97頁。圖369。
- [31] 蓋山林：前揭書，第99~100頁，圖381。
- [32] 蓋山林：前揭書，第265和270頁，圖1084，圖版四一·2。
- [33] JR. Don Ringe, *On the Chronology of Sound Changes in Tocharian*, vol.1,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96, 11.
- [34] 蓋山林：前揭書，第269和273頁，圖1097。
- [35] 容庚：《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44頁。其中作父從直目前正在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展覽。
- [36] 葛英會：《金文氏族徽號所反映的我國氏族制度的遺痕》，《北京文物與考古》，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45~47頁。
- [37] 韓康信、潘其鳳：《古代中國人種成分研究》，《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
- [38] 李水城：《四壩文化研究》，收入蘇秉琦主編《考古學文化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80~121頁。
- [39] 此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呂恩國先生見告，謹致謝忱。
- [40] 新疆考古研究所編：《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圖版5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301頁，圖一六一·1；吳振錄：《保德縣新發現的殷代青銅器》，《文物》1972年第4期第63頁及圖版陸。
- [41] 林梅村：《開拓絲綢之路的先驅吐火羅人》，《文物》（北京）1989年第1期第72~74頁（英譯稿見“Tocharian People: Silk Road Pioneers,” *Significance of Silk Road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s*, ed. by Tadao Umesao and Toh Sugimura, Osaka, 1992, 91~96）。
- [42] G. Clauson, “Philology and Archaeology,” *Antiquity*, XLVII, 1973, 40-42.
- [4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15~718頁。
- [44] 宿白等編寫：《中國的金銀ガテス展》，大阪：NHK大阪放送局，1992年，圖版8。
- [4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前揭書，第730~731頁。
- [46] 事在齊桓公三十五年，參見《史記·齊太公世家》。
- [47] 李學勤：《試論孤竹》，《社會科學戰綫》1983年第2期；收入《新出青銅器研究》，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4-59頁。

- [48] 《漢書·匈奴列傳》曰：“單于姓孛鞞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
- [49] 王國維：《西胡考下》，收入《觀堂集林》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613頁。
- [50] 傅振倫：《燕下都發掘品的初步整理與研究》，《考古通訊》1955年第4期第18~26頁。
- [51] 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54和356頁圖四·6和圖五·5。
- [52] A. Salmony, *Sino-Siberian Art — in the Collection of C.T.Loo*, Paris: C. T. Loo Publisher, 1933, Pl.XXVI-VII.
- [53] 田廣金和郭素新：前揭書，第175頁，圖一二二·4；杜正勝：《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3年，第351頁。
- [54]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同心縣倒墩子漢代匈奴墓地發掘簡報》，《考古》1987年第1期；《寧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學報》1988年第3期第343-344頁，圖九·7、10和13，圖版拾柒。
- [55] G. Borovka, *Scythian Art*, London: Bouverie House, 1928, Pl.52B, M.I.  
Artamonov, *Sokrovisha Sakov* (The Art of Ancient Central and South Siberia), 1973, 157, No. 208; 孫機先生認為，這個金牌的年代可能和倒墩子西漢墓相近，說見氏著《中國聖火》，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7頁。
- [56] 新疆自治區博物館，吐魯番地區文管所：《吐魯番艾丁湖古墓葬》，《考古》1982年第4期。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考古系)



## On the Tokharian God Ñakte

Lin Meicun

### Summary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Tokharians. In the light of our studies, the primitive religion of Tokharians is some dragon-god worship, which was called *Qing-Long* 請龍 (asking for the dragon-god) in Chinese Classics. As archaeological data of the Tokharian cemetery found in Shibarghan, Afghanistan revealed, the dragon-god of Tokharians always appear in pairs and look like two horses, so it should be the Nasatya-god worshipped by ancient Indo-Europeans. The Nasatya-god is one of the earliest gods in the ancient Indo-European religion, the artistic image of which first appeared in the Yamnaya culture between 3600~2200 BC. After Indo-Europeans migrated from their original homeland to various parts of world, their common polytheism was gradually changed as monotheism. For instance, Siva was worshipped by Aryans, Ahura-Mazda by Iranians, Griffins by Sakas and Nasatya by Tokharians. Our deductions also can get support from linguistic evidences. In Tokharian B texts the god is called as ñakte (= A nkät), but nobody knows where it comes from. Our studies show that Tokharian B ñakte should be the equivalence of nāsatya in *R̥g-Veda* and na-sa-at-ti-ya in the *Mitanni Treaties*. It is worth to notice that the images of Nasatya-god were not only found in many ancient rock-carvings of the Tianshan and Yinshan mountains, but also they were seen in many ancient “animal style” plaques made of gold, silver and bronze in the northern steppe of China. Obviously, these antiques with the image of Nasatya-god should have relationship to the Tokharian religious activities.